

中國民族性

1

百家論說 中國人 Chinese CHINOIS 中國人

亨利·查爾斯·薩〔英〕 古伯察〔法〕 密迪士尼〔英〕 庫克〔英〕 約翰遜〔美〕 麥華陀〔英〕 利希霍芬
梁啟超 魯迅 麥嘉溫〔美〕 羅斯〔美〕 陳獨秀 遺生 服部宇之吉〔日〕 杜亞泉 莊延齡〔英〕 柏賜
胡適 陶行知 朱希祖 羅素〔英〕 唐誠 梁漱溟 格爾巴特〔法〕 勒津德〔德〕 奧特〔英〕 毛澤東
林語堂 張君俊 勞德〔法〕 韋特格爾〔德〕 威爾布姆〔德〕 蔡元培 王造時 海威〔美〕 大谷孝太郎
蔣中正 孫本文 費孝通 蕭孝嶸 繆鳳林 牟宗三 費正清 吳自甦 吳主惠 張君勵 項退結 成中英
錢穆 杜維明 吳曉賢 謝康 孫隆基 柏楊 張岱年



沙蓮香主編

中國 民族性

1

百家論說中國人

沙蓮香主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姚永康

裝幀設計 陳智昌

書名 中國民族性(1)

——百家論說中國人

編者 沙蓮香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新豐柯式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二十號801室

版次 1999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32開(140×203mm) 37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695·3

© 199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原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由原出版社授權本社在除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主編簡介

沙蓮香，女，1984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及社會學系教授。1989—1993年，前後任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部、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部、東北大學文學部的客座教授。1982—1984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研修社會學及傳播學。1978—1981年，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研修實驗心理學，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

目前從事於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研究，人的現代化研究。前後負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民族性格”、“國情調查叢書·鎮平卷”、“城鎮下崗失業群體的承受能力研究”、國家計委委託項目“1996—2010中國社會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國民素質現狀及對策研究”、國家教委(教育部)規劃項目“人際關係研究”、“國民素質建設與中國現代化研究”等。主要著作有：《社會心理學》(著)、《中國民族性(一)》(主編)、《中國民族性(二)》(著)、《社會心理學》(主編)、《傳播學》(主編)、《人格的健康與治療》(主編)、《現代社會學》(主編譯)、《中國百縣調查叢書·鎮平卷》(主編)、《一個貧困村的變遷》(主編)、《外國人看中國人100年：怎樣看人看我》(主編)等。

前言

此獻給祖國和人民的，乃“中國人民族性格與中國社會改革”課題組集體之作。

“中國人民族性格與中國社會改革”課題，係“七·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1986年12月起，用去兩年時間，十來位課題人員之智慧和頗多努力，終以《中國民族性》的問世而告結束。

作為課題成果的《中國民族性》有兩本：其一為“歷史量表”或稱資料集，把歷史上有關研究中國人的主要著作及其主要觀點製成表，同時收進了王容芬同志為課題提供的M·韋伯談中國人的論文；其二為“論著”，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形成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基本觀點。

這本“歷史量表”意在給人們勾勒一個歷史上有關研究中國人的主要觀點及其主要論據的詳細圖表。表中共有71個人物，500多個觀點。

本量表是以人物為線索，選其主要觀點及其主要論據構成。其編排方式是以年代為序，首篇著作發表年代在最先者，名列首位，發表年代在其次者，名列第二，依此類推。

收進歷史量表的主要觀點及其主要論據，是從有關作者著作中選取的原文；作為小標題的觀點，基本上是作者原文中出現的用語，以

此保持量表的真實性和可用性。

量表是遵循作者原文原意製作而成，因此，量表中的觀點有不少是相互對立的，對中國人身上類似的現象，有人頌為美德，又有人貶為不德或惡德，等等。但所有對立的觀點，都編進了量表，以如實反映對中國人研究的歷史面貌。

在研究者觀點有明顯重複的時候，壓縮了部分研究者的論述而只摘其觀點，因此，量表中出現了觀點論述不均的情況。

還有，對那些令人不快卻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人的觀點，也統統編進了量表。

在已有的歷史資料中，尚有不少國內外學者和文化人對中國人作了很多研究。為了篇幅適當，未能編入量表。

顯然，表中的“觀點”，有一些只是表述上的不同，而其意義卻無甚區別，比如，“人本位”、“人文主義”和“以人事為中心”等。故此，量表中的“觀點”雖然極多，但不免有內容上的重複。

本書目錄基本上依據歷史人物的首篇論著的題目編排，個別的取名於該人物的觀點。

無論如何，希望本量表能在吾人研究中國人上起到啟發人、激勵人的作用。

參加量表製作工作的有（以姓氏筆畫為序）：許風海、鄭為德、苗少波、羅新、袁方、唐順益、彭泗清。他們為量表的製作，花去很多業餘時間，兢兢業業，不辭辛苦，實在是難得的。

日本友人和學者南博、福武直、阿部幸夫、佐藤毅、太田喜晟、青井和夫、齋藤秋男、山本武利、金津澤聰廣、片岡公正諸先生，在我回國後贈予的書刊有百餘冊，其中大量是有關中國人特點及日本人與中國人比較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徐鴻浜同志為課題無私提供資料；人民大學社會學所于碩同志，在書海中尋找“為我之物”，為課題收集資料；人民大學出版社王穎、李淮春同志為課題成

果的問世積極提供條件，均對課題做了寶貴的貢獻，在此一併致以深忱謝意。

沙蓮香

1988年12月

代序：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幾個問題

戴逸

文化是人類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以及他們在改造世界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包括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人類自我。這種方式與能力，各民族、各時代的情況很不相同。古代人對世界改造的方式與能力跟現代人大不一樣，這個民族與那個民族的方式與能力也不一樣。這是不同類型的文化所決定的。客觀環境對人類提出挑戰，人類怎麼對付它，或者說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各時代、各民族行動的目標、方法、知識水平、價值標準、生活態度、心理狀態、世界觀都不同，這些構成文化的因素就決定了人們改造世界的方式與能力不同，也決定了他們在改造世界過程中所獲得的成果不同。

文化作為人類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物質成果與精神成果。有的是有形的，有具體的事物作為文化的載體。如上古時代的石器代表一種文化，陶器也代表一種文化，現代的工廠、鐵路、輪船、飛機等具體事物代表工業時代的文化。這些具體事物反映了人類創造性勞動，凝聚了人類的智慧。可以說，它們是人類智慧的物化。如果離開了精神創造，那麼具體事物就失去了文化意義，就不成為文化，只是一堆僵死的物質的外殼。在這裏，物質與精神相互聯繫，精神的創造、人類的智慧通過具體事物表現出來。人類的科學技術通過工業產品表現出成果，人類的藝術通過藝術品如一幅畫、一座雕像表現。物質必須凝

結人類的智慧，人類的創造才取得文化意義。自然資源不具備這一條件，所以它不是文化。另外一種文化成果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着，但它又確確實實存在着，像典章制度、風俗習慣、道德規範，都不表現為具體事物，但也是人們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於更深一層完全屬於精神方面的如科學、藝術、審美觀、道德情操、價值觀念，也是人類在改造世界、創造世界的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文化成果。

總之，廣義文化既是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又是改造世界的成果；既表現為有形的物質的載體，又表現為精神和內在的心態。這樣說來，四面八方，裏裏外外，無所不包。文化包含的內容這麼寬廣，怎樣來進行研究呢？研究什麼呢？

文化是個複合體，包括許多部門、許多學科，它的研究必然涉及到許多部門、許多學科。文化與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藝術、宗教、民俗學都有關，文化滲透到各個領域。但我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不是去研究文化系統中包含的各個具體的部分。一個文化體系、文化實體由許多要素、部門綜合構成，所有這些具體的要素、部門綜合在一起，有機構成文化實體，或者說，有機構成文化這個大系統。但是，文化實體本身並不簡單地等於許多具體要素相加的和。當許多部門、要素相互聯繫，綜合形成一個文化體系，這個體系本身又具有新的質態，有自身的質的規定性，有它整體性的特點，這種整體性的特點並不表現在各要素的相加。整體包括部分，但整體並不簡單地等於部分之和。所以中國文化並不是把中國的科技、文學、哲學、藝術、歷史這些部門加起來，不能這樣簡單地等同，這樣簡單地相加不能把握文化的整體性。現在我們研究文化、討論文化當然要涉及到許多具體部門，但探索具體部門的規律性，不是文化研究的任務，這應由具體部門的研究人員來解決。文化研究的任務是把握文化體系整體性的特點，作綜合性的考察。

文化研究的對象首先是文化的性質。一種文化系統總有它本身的

質的規定性，區別於其他文化。我們一般用社會發展形態來區分文化的性質，也就是說，用生產方式、社會制度來決定文化的性質，表現文化的時代性。文化具有時代性，不同生產方式具有不同性質的文化，不同性質的文化是不能混同的。一般說來，後來者居上，愈是後來的文化，愈是先進，因為後來的文化吸收、綜合了以前的文化，加以新的創造、新的發展。當然，一種較高的文化，剛剛處在新的階段時，處在幼稚階段時，不一定能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還沒有舊的文化那樣成熟、豐滿，但隨實踐的發展，隨新文化全面的成長，必然超過舊文化。

其次，我們應研究文化的類別。文化是可以用種種方法、標準分類的。如用生產、生活方式分，可以分為漁獵文化、畜牧文化、農業文化、工業文化；用地域、國家加以分類，可以分歐美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原始時代的文化乾脆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加以分類，如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舊石器文化）、青銅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文化包含的領域寬廣，內容複雜。為了研究的方便，可以用某種標準來加以分類，大類的下邊可以分成小類別，成為亞文化。大文化體系可以分成許多小文化。像中國古代文化這個大文化系統裏，就包括了許多亞文化：中原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等。所以應用各種方法、標準進行分類。在分類中加以比較、加以分析，認識各種文化的共性和特點。

文化研究還應包括對文化的功能，即文化的效果、價值之研究。前邊我們說過文化是人類創造的（動物談不上文化，只有它的本能反應），反過來，文化又塑造了人。每個人都在一定的文化圈子裏生活、成長、受教育，取得知識，培養自己的能力，學會怎麼思考問題，怎麼行動，怎麼適應環境，怎麼改造環境。人是社會動物，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環境、社會環境中，他屬於某種文化，我們說中國人跟歐洲人、美洲人不同，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種族不同，歐美人是白種人，中國人是黃種人。另一方面是文化不同，中國人與

歐美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史、不同的生活態度、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有一些華裔的美國人，他從小在美國長大，如果完全吸收美國文化，雖然在血統上是中國人，但他在文化上是美國人，他對問題的反應跟我們已經不同。所以說，文化塑造了人。

此外，談談文化比較研究。各種各樣的文化，有共性，也有個性，各有它們的優點與局限性。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部分，各種文化的產生，都有它的根據，都有它的合理性。隨着時代的發展，有的文化跟不上時代的要求，衰落了、消失了。文化的比較研究很有意義，觀察歷史長河各種文化的潮流，豐富多彩，變化無窮。當來潮的時候，一種文化開始生長，洶湧澎湃，很快地發展。當退潮的時候，它銷聲匿跡。文化的比較有高下之分，先進與落後的區別。因為文化總是從初級形態進化到高級形態。不承認高下之分、先進與落後之別，就等於否認文化的前進性，也否認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但文化的比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高下之分，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優劣之分。因為文化有類型上、風格上、情調上的差別和表現手法的不同等等。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人類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地域條件下，創造不同形態的文化。所以各種文化的差異性，不能完全用高低、優劣、先進與後進來判斷。比如中國的荊楚文化、幽燕文化、巴蜀文化等一些地區性的文化，各有特點，但不能說哪種文化優越、哪種落後。去年上海提出海派文化，當然有它優越的方面，但不能說它比其他文化先進，它同樣存在局限性，不能絕對地用先進與落後來區分這種地區性文化。即使人類早期的文化，從總體上來說，它處在初級階段，當然比現在的文化落後。但在某些方面，它達到的成就，是現今先進文化不能比較的，趕不上的。像希臘文化，是一種初級階段的文化，但希臘文化的許多成果，恐怕我們今天也創造不出來。文化的比較可以使我們對各種文化加以鑑別，很重要的是使我們認識它們的豐富多彩，認識它們的價值，認識它們在人類發展中所佔的地位。

中國傳統文化是個大問題。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我們

在這樣一個文明古國裏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固有的文化傳統是什麼呢？先談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發展，即它產生於什麼樣的環境，是怎樣發展的。對中國文化影響比較大的因素，有經濟條件、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地理環境，這些都影響中國文化的發生、發展。首先，中國是農業社會，六千年前，中國就種植農業作物。在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佔統治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在這樣的一個農業社會裏，民族性格既有勤勞樸實的一面，也造成了穩定、保守、散漫的一面。

其次，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是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多年了。專制主義、官僚結構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第三，中國是個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國家。人們從小到老，生活在一個宗法結構中間。宗法意識、家族意識非常強烈。中國文化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中形成的。

第四，地理環境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影響。中國在亞洲東部的大陸，東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將近10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跟其他文化發達地區隔得比較遠，交流比較少（當然歷史上也有過交流，如絲綢之路，但這種交流比較少）。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化系統，不同於西方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豐富，但它有個主幹、核心，這就是儒家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當然，儒家文化本身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很大的變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百家爭鳴”，儒家只不過是許多學派中的一派。漢代，董仲舒發揮了儒家學說，使其成為統一的專制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成為官方文化。漢代儒家不同於先前的儒家了。以後，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儒家也有變化，它吸收了佛學。到宋代，產生了程朱理學、新儒學。儒家文化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很複雜的變化過程，也吸收、融會了其他文化，很明顯地吸收了道家、法

家、佛教思想，也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化。所以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的傳播、交流、衝突、融合的過程。

中國文化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成長，但它也有過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大規模的接觸、交流有3次，一次是佛教的傳入。從東漢起，歷程幾百年，開始是比較粗淺的佛教教義的傳播。但經過長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發展到高峰，產生了中國化的佛學——禪宗。到宋代，產生了在佛學影響下的儒學。佛教的傳入經過了幾百年的過程，這是中國與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極大。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從利馬竇到湯若望、南懷仁，從明末到康熙年間，一百多年期間，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有好幾百人，帶來了西方的宗教，也帶來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曆法、數學、武器、地圖、建築、繪畫和其他自然科學。一百多年的時間，西方譯著和傳教士隨身帶來的科學儀器也很多。但雍正、乾隆年間，這種交流中斷了。原因很複雜，當時中國對西方缺乏認識，所以沒有形成一種吸收融合西方先進文化的潮流。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大砲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被動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文化的衝突，又是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吸收、交流、衝突，到現在還沒結束。當然，現在封閉的局面已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歷史上那樣的閉關狀態。中國已進入世界歷史的潮流中，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將在批判地吸收傳統文化的同时，隨着全人類文化一起前進。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是重視人際關係。

在中國，倫理道德、歷史學這一類科學比較發達，而不太着重於對自然的研究，不着重於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中國自然科學相對來說不發達。

中國編《四庫全書》時（這是中國古代文化最盛時，也是中國古文化的一個總結時期），法國像狄德羅、盧梭等百科全書派正在編《百科全書》，通過這兩部書的比較就可看出東、西方知識結構的不

同，也可看出東、西方文化性質、價值觀念的不同。當然古人對自然科學也不是漠不關心，但不是像西方人那樣把它作為一個純客觀的對象，排除主觀性去研究它；而是用“天人合一”的觀點，用主觀的思想感情、主觀的意象賦予自然界以種種意義。中國的詩文裏講自然的很多，都是以自然界為題材，但是這只是敘述，而不是用科學的眼光去研究它；是欣賞它的美，而不是追求它的真。所以中國文化的特點，比較着重於人際關係，有人稱之為人文主義、重視人，但我認為人文主義是西方的思潮，有它特定的內容，恐怕跟中國的傳統文化還不是一回事。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際關係、重視人，是將人放在倫理規範中來考慮的。不是肯定個人價值，而是肯定個人對其他人的意義。它的積極意義就是重視人的歷史使命，它講人對社會、對別人的關係，強調人要對社會、對別人做出貢獻。但它也有消極的一面，就是忽視了人本身的權利，它把人的價值過分地放在對別人的關係上，而在自己本身。它講倫常關係、君臣、父子、夫婦等這一類，都是在講人和別人應處在一種什麼關係中，但是這個社會給人以什麼保障呢？它忽略了這一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同政治結合得比較緊密。二千多來年，儒家思想一直佔統治地位，而且深深滲透到國民性中，它同官方結合得就非常緊密，是官方哲學。“學而優則仕”，其治學目的就是做官、入世。儒家有它積極的方面，即它是入世的哲學，不像佛家。儒家重視文化對社會的作用，所以儒家有許多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它強調要治天下，是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但是它密切結合政治也產生了另外一種缺陷，即依附於政治，經常以官方標準做判斷，把很多事情都附會到政治上去，甚至彗星出現、火山爆發、地震等自然現象都成了被附會的對象，成為天人感應的一種現象，認為政治上有失誤，天上就要“示警”。另外，缺少自由的創作，凡是不合於官方口味的，都

被稱為異端思想，所以中國古代的思想迫害屢見不鮮，文字獄歷代都有，政治干預文化就會產生消極的後果。

中國文化第三個特點是帶有非常強烈的宗法家族色彩。中國沒有統一的像西方那樣強烈的宗教，沒有那樣大的教權（西方的教皇在中世紀甚至比國王地位都高），但是族權——宗族的權利、家族的權利很發展，它實際上控制着老百姓。老百姓把兩個東西看得最重要：一個是真命天子——皇權，一個是老祖宗——族權。政權跟族權的勢力滲透到各個方面，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中起極為重大的作用，“君”和“父”是中國人的兩個最重要的概念。“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也就是說：人和動物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人有“君”和“父”。與“君”和“父”相應，就是中國道德觀念規範中的“忠”、“孝”。忠臣、孝子是最完美的人格。所以宗法家族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在國民性格中也是很重要的。這還可以從中國古人有兩個重要的生活目的——（1）光宗耀祖，（2）傳宗接代看出來。

光宗耀祖。人活着是為了使他的家族光彩，個人奮鬥、讀書應舉、作官發財，固然是為自己享受，但他更大的目的卻是光宗耀祖，給家裏立個牌坊或掛一塊匾，或者給家裏修墳掃墓。

傳宗接代。就是生兒子，把他家族綿延下去。“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家族的延續和家族的昌盛。

上面提到的“孝”，我想也應該分析，它當然有好的方面，即它是對父母的正當感情、正當態度。贍養父母、尊敬父母，理應如此，但是如果把這種感情態度提升到一個道德原則，並且加以絕對化，就必然會產生許多流弊。中國古人心中最大的悲劇是什麼呢？不是個人的死亡，甚至不是國家的滅亡，而是宗族的滅亡，滅族之災是最大的不幸。比如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它是一個悲劇，講的是封建大家族的沒落。

下邊，我再談一點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和表現方法。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似乎比較注重直觀、着重於體驗，相對來說在推理分析上比較

薄弱。中國人思維方法的特點是先直覺到某一個真理，然後用比喻或類比等方法來表現這個真理，用例證的方法來加強、說明這個真理。缺少從未知推到已知的過程（並不是沒有，但這方面比較薄弱）。

讀中國思想家的書，讀中國古代的經典，往往感到有深刻的哲理，但是其思想是跳躍式的，在他們的體會中想像的色彩比較多，比較凝厚和強烈，所以它有許多精彩的片斷，有許多閃光的顆粒，但是不連貫，缺乏多方面的論證。中國古代聖賢喜歡用格言方式來表達思想，這些格言沒有展開，沒有充足的論證，比如《論語》，它的道理就幾句話或一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只有一句話，這個《論語》就是語錄式的。老子的《道德經》也是非常簡練。宋明理學家許多理論也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在一兩句話中講一個生活的道理，簡短有力，把真理濃縮在片段中間。這同西方著作不太一樣，西方的著作都是大部頭，讓人看了以後，覺得很繁瑣。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

中國的藝術也有其特點——強調寫意，而不是寫真，現代的中國畫採取了西方的一些表現手段，古典的中國畫中的人很小、很遠，畫在山水風景中間，強調的是人跟景的交融，人在景中，不是強調人的面目；“傳神之筆”要傳神，不像西方油畫那樣寫實、寫真。油畫創作很真實，簡直像照片一樣，它講究比例、線條、透視、色彩等等，畫人要畫模特兒，要講骨骼肌肉。國畫不講求這些，畫人的比例也不大對，臉大身子瘦。中國的戲曲好像也有這種情況，也是表現神似，只求意思到了，而不是把真實的細節、生活中的真實都全盤托出。

中國人表達感情比較含蓄，保持分寸，保護感情，封閉自己的內心世界，不是無保留地表現。文化人與野蠻人是有區別的，他不能毫無節制地發泄感情。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內心世界設置一層帷幕或紗巾，或薄或厚擋住內心世界。中國文化設置了較厚的帷幕。人類的喜怒哀樂本是自發的、本能的，如果毫無節制地讓它泛濫，就勢必引起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中國文化集中在人際關係，因此感情世界的面

紗較厚，按一定規範、程式辦事。所以中國人表現感情沒有採取像西方的接吻這一類方式的，而是用打躬作揖，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感情。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幾個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儒家的中庸。關於中庸已經寫過許多文章了，中庸這一概念承認對立面的矛盾、統一，但解決矛盾的方法是矛盾的緩和、調和，更高地強調了事物統一性的方面，保持一種和諧。中庸之道是不走極端，防止矛盾的激化。要理解中國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第二個概念是禮義。這也是中國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對個人來講，就是“克己復禮”，約束自己的慾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不然就會相衝突。“禮”是調解人和人關係的準則，也是工具，“克己復禮”既是理性的克制、自覺的克制，又是一種強制性的克制。人必須按禮義來辦事，把自己約束在一個人際關係規範裏，“禮義”不僅約束個人，也約束國家、家庭，於是有了“禮義之邦”、“禮義之家”等。中國人向來自稱是“禮義之邦”，強調禮義，不重視法，禮義和法是相對的，“禮”帶有更多的自覺性，帶有更多的教育的性質，“禮教”形成一種“講禮”的風氣。而法更多的是強制，中國古代強調了“禮制”，而不強調法制。中國的法也有，而且在古代還很發達，但中國的法也有特點，即它似乎是專用來懲罰人的。一提法家就讓人想起嚴厲、刻薄和無情無義來。所以，中國古代的刑法特別發達，民法不發達。對那些破壞社會制度、損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者懲治性很強，而那些財產糾紛、婚姻糾紛等老百姓日常間的衝突卻不是付諸法律，而是由家族來處理，不驚官動府。由此可見，古代法規打擊什麼是很明確的，但它保護什麼（老百姓的正當利益等理應置於它的保護之下）就不明確了。歸結為一句，就是法制不健全。還有就是“義利”的觀念，重義輕利，強調道德修養，強調主體性的自我完善，而不着重於物質利益。《孟子》開章（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話，“王曰：‘子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話是很正常的，但孟子卻當頭一棒，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而已矣”，然後是對梁惠王的教